

五大学战时边疆服务的组织者张伯怀与崔德润

金开泰

中国基督教会在上世纪 40 年代开展的边疆服务，尽管后世可以说有其局限，但当时适应了我国抗击日本侵略，强固大西南及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大转变，在与大学的合作中推进了服务地区里程碑性的进步，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也有着历史性的贡献，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这一工作在华西坝的齐鲁大学最着力，边疆服务部前后两任主任张伯怀、崔德润所做实事尤多。



张伯怀，山东临淄人，1899 年出生，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 1922 年第一届毕业生。任过中学教师。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齐鲁大学任教。中华基督教总会 1926 年成立后，当选为青年执委。因支持“乡村计划”，1929 年秋天，他和罗世琦在参加了校董会之后回到学校。住房的后窗被学生捣毁。1938 年 12 月参加印度马德拉斯举行的基督教第

三次宣教大会。1938 年随学校南迁到成都华西坝。1939 年至 1941 年秋任齐鲁大学神学院教授，文学院院长。先与范定九组织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组织学生暑期服务团去川陕救济伤兵和难民。

主持筹备边疆服务。1939 年夏，中华基督教总会总干事诚静怡因抗战之转移，西行入川，经滇、桂、黔、康等省，目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状况，在重庆乃召集蓉渝教会领袖，号召为少数弟兄民族服务。此时张伯怀刚刚完成了一段西南和西北的长途旅行后到了重庆。他两人在陪都有一个月的聚居，达成了到边疆去的共识。两人及其他在渝的同道即着手筹划边疆服务的工作。6 月向行政院呈文，很快得到答复，并允许试办期经费接济。7 月诚静怡在香港召开了基督教全国总会特别干部会议，张伯怀特邀出席。会议通过了边疆服务的有关提案，确定邀请各方组成边疆服务委员会。也得到基督教四川大会的支持。在诚移居华西前请张伯怀为义务筹备。1939 年 10 月张伯怀带领金陵神学院毕业生张品三、华中大学毕业生张宗南、肖兴汉，东北大学毕业生张楚望，金陵大学社会系教授张锡嘏等工作人员由重庆前往成都，得到了在华西坝的齐鲁大学支持，在大学的住所内成立了边疆服务办事处。可

惜诚静怡于 11 月 15 日突发脑溢血病故。副总干事崔宪祥仍请张伯怀为驻华西全权代表，张在各方支持下继续了诚静怡的未竟事业。拟定了边疆服务部的具体方案，包括《工作计划大纲》、《服务规程》、各类条例及《区部组织细则》等。根据总会的决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委员会，制定了组织章程。第一届委员会孔祥熙为名誉主任委员，吴贻芳为主任委员，蒋廷黻为副主任委员，陈立廷为会计。相应设立了宗教、教育、社会、卫生、研究调查等几个设计委员会，其主席分别由孙恩三、陈裕光、颜福庆、陈钱生、杭立武担任。每个设计委员会设有若干委员。张凌高、刘枢铭、陈志潜、高文明、丁克生、章之汶、费尔朴、宋诚之、晏阳初、傅葆琛、顾颉刚等亦在其中。拟订了工作方针和计划，选定了工作人员，筹划了工作经费。1939 年 12 月委员会在重庆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亦在成都正式成立，1940 年 2 月张伯怀被正式聘为边部主任。

边部在建立的过程中张伯怀与华西坝五大学的领导与专家学者进行多方筹划，共谋发展。中华基督教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规定的宗旨是：“以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抚圉边民之德意，对边疆民众从事各种服务，藉以启发边民知识，救济边民疾苦，改善边民生活，促进边民团结，充实国家能力。”边部的工作服务区，是川、康、滇、黔边地。第一年以川康边区为服务区，以后逐渐扩充至滇、黔、湘、桂、甘、宁、青等处。工作为研究、教育、卫生、与社会服务等。边疆服务采用“服务区”制度。“在每一服务区之实地工作，应尽量与当地、中央地方机关合作，在调查研究方面尤应尽力与附近之学术机关合作。”边部创办了《边疆服务》和《边疆服务通讯》两份杂志，前者以介绍边部工作及边地情形为主；后者以传递边部信息，联络同工情感为主。

推动实施边疆服务工作。边部先后建立了川西、西康和云南三个服务区（云南服务区后交出），在服务区兴建学校、医院、农场、畜牧场、教堂，开展各种训练，在服务区工作的先后有 400 余人。

张伯怀正式任职之后，于 1939 年秋与 1940 年春，先后到川康滇黔边地考察，决定先行建立川西服务区，而后再谋发展。早在 1930 年代初期，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便在理番开辟工作区，曾派牧师毛树森在理番布道，建造了 3 处礼拜堂，1 处学校，但在 1935 年兵乱中毁于一旦。边部决定先在这里建立服务区。1939 年 12 月 3 日（礼拜日）在四圣祠礼拜堂举行欢送礼拜。张伯怀向全体同道一一介绍将出发的张

品三等同道。他们12月13日出发到理县，揭开了边部服务川西少数民族的序幕。1940年3月张伯怀偕总会代理总干事崔宪祥视察川西区工作，4月初回到成都。4月中旬该区第二批工作人员13人又由成都出发。经过考察，区部改设于理县威州。区部分处设于杂谷脑。设分区子达寨、日尔觉寨、龙溪沟寨3个三处。教育、医疗卫生、生计等逐步开展起来。

1940年5月31日，张伯怀忙于齐鲁的工作和安排学生暑期到边疆服务，不能抽身，乃派于道荣、张广文、崔德润奔赴西昌，借四川浸礼会在西昌的房屋开始展开工作，奠定了西康区的根基。区部设于西昌，以宁属九县为范围，以彝胞为服务对象。先后以于道荣、马鸿纲、李言三、王禾章(伯勋)、刘焕章(崇文)为主任。

1943年3月张伯怀受总会委托访问云、贵两省教会，顺道考察当地服务工作之需要与机会。4月，张伯怀在昆明考察，与云南省教育厅、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及西南边疆语文学校等机关两度会谈。当地人士很快组成云南边疆服务设计委员会，推选教育厅长龚仲钧为主席，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孙起孟及联大社会系陶云达教授为副主席。边部遂以滇北之寻甸为中心，由张宗南负责，开展云南区的服务工作。其后云南服务区交由教会云南大会，边部不再延及。

组织各大学师生参加边疆服务。边部于1940年至1946年间，先后组织大学生暑期服务团5次赴川西服务区、3次到西康服务区进行实地服务。人数合计近300人。1942年夏的一次还在佳山培训了当地小学教师70多人。每次都有专家学者参加，出发前也由专家学者讲授相关知识，作好充分准备。1940年6月顾颉刚作“边疆服务团团歌”(见顾颉刚小记)，由作曲家李抱忱谱曲。顾到齐鲁后与张交往十分密切，两人又有看重边疆的共同见解，作歌应是受张氏委托。团歌唱出了边疆服务的宗旨与气势，也表达了两人的基本思想。1940年张伯怀亲自率“暑期边疆卫生队”到西昌。每次服务返回后都有总结，1941年夏的一次总结汇印成《川西调查记》，由教育部出版。1945年他亲自组织了成都8位，西昌6位的“凉山抗建服务团”。请诸多学者讲课，结束时邀请了各大学校长，关心边疆的学者参加。刘文辉、西昌行辕张伯常等到会讲话。服务团在凉山35天，行程900多里。

促进边部与大学合作研究。边疆服务实际包括实地服务与实地研究。他强调调查研究是决定服务方针的依据，可以解决服务的许多困难。服务要科学化，服务中要有研究精神，服务人员要养成写报告的习惯与技术。所以边疆服务区又是五大学

的学者们最好的研究场所。在边地服务中发现的问题都聘有关专家帮助解决。学者如李安宅等也成了边部调查研究的指导。1944年12月5日他亲自偕吕高辉去设计畜牧改良场，选定场址。1947年总部迁到南京后，特邀请高文明、王俊贤、宋道明、及四川大会的刘伯常等7人组成华西辅导委员会，就近协助川西区的服务工作。

他随时关注并实际投入边部工作。在边部筹备期，他两次到川西和西康地区，进行调研。1944年刚病起就赴川西区视察与慰问服务同工，其后又数次去服务区，1942年12月在成都广播台做了边疆服务部工作报告，呼吁“所有关心边疆事业的朋友们随时给我们鼓励指导及各方面的帮助”；他在《边疆服务》发表了许多文章，如《卷头语》、《服务运动之重要》、《本部的回顾与前瞻》、《本部同工应有的心理建设》、《服务员的精神准备》等都针对边部的工作适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抗战胜利后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边部工作难以为继，张仍鼓励同工“再接再厉”，1945年11月张赴渝代理干事协助“复员”一年。1948年4月边部邀请国际有名的专门人士高瑞士等六人，由张率领到服务区考察。在西昌停留两周，又到威州，遍历各区工作点。高瑞士特赞边部“工作使命之艰巨与伟大”，边地服务是“一种爱国我作”，不为困难所屈服的“基督教真精神”。在辞职后张伯怀也以场内人的角色评价在边地建立的学校、医院等“简直是一件神迹”，“最重要是本部一个伟大的运动的开始”，“在今天的中国，边地服务，简直是不容稍缓的事业……我们在九年以前便不自量力，不计利害，不计成败地揭起了边疆服务的旗帜，发起了这个早就应该发起的运动，我们很大胆地作了开路先锋。”

张伯怀在边疆服务部任主任工作至1948年6月。“十年以还，找人才，筹经费，拟计划，席不暇暖，身心劳瘁”。被美国传教士柯乐智誉为：对于边疆服务的实际推进乃至基督教在中国的事业而言，是“那一时代最杰出的领袖之一”。1950年8月他接受中共邀请，脱离边部，到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工作。然而，到1951年，迫于自上而下席卷全国的“控诉运动”，他“经过学习思考”，“转变了立场”，认为自己“知道的却多些，而且责任也重些”，于是用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搜集和整理材料，“写了一篇万言书的诉文”。7月4日还私下给崔德润写信，提供可以“贡献给崔当作控诉的材料”。声称“自从参加了上海基督教团体所举行的控诉活动以后……才意识到边疆服务部应该控诉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了。”他写了七条，包括与孔祥熙的关系、接受善后救济总署、援华会等的资助、教育部的领导、带外国

人参观考察、为美空军在凉山劝导彝民协助失事飞行员等等，事实上成了一篇价值判断完全颠倒的边疆服务简史，鼓励崔参加控诉。1956年后似在上海居家赋闲。

张伯怀译有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著的《基督教与社会秩序》，1946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天主教及基督教人物传记》：《灵花-圣法兰西斯行传》，1948年由广学会出版。著有：《新约正经成立史》1998年由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张伯怀的照片由王曙生先生供）



崔德润，（1902—1994），名鸿泽，以字行。山东潍坊寒亭人。

1915—1919年曾在潍县文华中学校求学，期间，因为家贫差点辍学，在美国校长的帮助下，靠勤工俭学终于完成学业，并由校长推荐考入齐鲁大学。1925年齐鲁大学文学院毕业留校做助教。

1926—27年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1928年潍县教会组织为文华和文美中学及培基小学三校组建校董事会被推为校董，并被选为

董事会书记。1931年冬受校董事会推举出任广文中学校长。在崔德润的奔波下学校于1932年9月得到省教育厅的批准立案，为学校制定管理制度，聘请优质老师，平整校园、修路，让学校起死回生，并隆重举办了建校五十周年。1937年4月参加华北教育考察团赴日考察，7月参加庐山中央训练团，受到过蒋介石接见。11月率学生赴沂临抗战，因孤立无援返回。1946年秋曾返里探亲，受到原广文中学在潍城的师生80余人的热烈欢迎，潍县师范学校还请他去演讲。1938年末学校被迫关闭后流亡到自贡，任蜀光中学教务主任，1939年到成都齐鲁大学任副教授兼男生部主任。曾住方正街72号（原华英女中），与张伯怀家同院。

边部筹建时任义务秘书。1940年5月31日，受张伯怀委派，崔德润和于道荣、张广文、奔赴西昌，奠定了西康区的根基。1940年经张伯怀引荐接替张锡嘏，任川西服务区主任，一直到1947年。1946年总部决定迁往南京，在成都设一办事处，任命他兼任办事处主任。

川西服务区在崔德润的管理下，先后办起正规小学二处，妇女纺织习艺所一处，民众夜校三处，半日学校一处，一个民众图书馆，还开展流动阅览。在生计服务上，由王贯三主持，邀请了刘国土任生计干事，设立了畜牧改良所，进行麦病防治，示范造林等；医疗卫生设立医院和诊所，开展了住院、门诊、戒烟及巡回医疗服务。马锡山主持的威州医院，在当地享有极高信誉，被誉为“川西第一”，获赠“百家

生佛”。1944年春恶性麻疹流行，崔与马锡山前去扑灭，辛苦备至；1947年8月马本人积劳成疾逝世，年仅38岁，受到当地士绅的连署悼念与称赞，全县男女老幼，无不涕泪交流。称他为“疾苦者的救星”，“边疆服务之功臣”。

他主持的川西服务区与大学开展了广泛的合作。1941年7月，五大学举办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川西区。此次由边部联合教育部共同举办，教育部派王文宣担任团长，主持团队工作，教育部拨款五万元。崔任总干事，协调开展活动。边部发现川西眼病“十人九病”，乃邀陈耀真率队前往，与当地医疗队结合，进行调查，提出预防与治疗措施；川西马锡山发现“恶浊”，1943年商请侯宝璋前去作病理研究，结果确诊黑热病7例，并发现了病原体的寄生虫为中华白蛉，证实了理县一带亦有黑热病；1943年5月边部与华大博物馆、华西边疆学会在化学楼联合举办羌民文化演讲与展览会，展览了羌区风光、羌地古物、羌民宗教与生活四组，有实物、照片、速写。葛维汉应邀演讲了“羌民的习俗”，反响很好；1945年春由崔德润和干事萧乐儒带佳山寨小学生及妇女识字班一行17人到成都观光，访问了女青年会的民众学校、航空子弟校、华英书局、燕大、齐大、金女大、中央日报馆等，受到了省主席张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省教育厅长郭守有等的一一接待，成了羌民史上的一大创举，在互相接触与交流中开拓了眼界，学校、政府及内地人士也增加了对边地的认识与了解。

抗战胜利后，他的工作仍没有放松。1945年11月22日他在威州召开同工会议，要求将医院旧用房改为社会教育所，开辟阅览室、游艺室、学习室等；1946年初召开教育事工检讨会，要求学校活动“应与边疆民众实际生活发生密切关系，预期实现学校为边疆民众生活之指导中心，并应充实各小学的医疗设备，以协助推动民众教育”，又开办了理番县的师资培训班、诗歌朗诵村、儿童读书会等；内战时期他于1946年和1947年两次出巡边地，第二次应卓克基土司邀请带杂谷脑医院院长崔毓珊，医好了土司的儿子，两人被土司看成了“大恩人”。

1947年崔德润接任边部主任，1948年赴美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他专程拜会了原潍县文华中学老校长卫理士博士，还参观了定期对外开放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白宫。在哥伦比亚大学参观时，正好遇到校长艾森豪威尔，曾与他合影。期间边部职务由刘龄九代理，1949年春回国后，继续担任边部主任。1950年1月12日他写信给边部全体员工，就迎接“光明伟大的新时代”，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要努

力“做新民”；其次要加紧学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护政府政策。1950年7月29日便根据政府指示向四川省公安处外侨管理科报送了五分材料，随时准备“移交政府办理”。在实行“三自的原则”下，仍艰难维持。1951年“控诉运动”开始时总会指示他在华西组织一次关于边疆服务部的“控诉会”，他又接到了张伯怀关于控诉材料的长信。但史料没有留下他的反应。1952年川西区呈请茂县专署接办，直到1952年底结束。西康于1954年3月结束。1955年10月边疆服务部董事会召开会议，崔列席，宣读了《边疆服务部办理结束报告书》，10月31日历时16年的边疆服务运动正式结束。

崔德润1956年去大连，参加市政协社会人士学习班，1957年被安排为大连群成中学负责人。1958年以“特等特务”嫌疑犯，被捕入狱。1966年被判历史反革命罪，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如期服刑，1973年刑满获释，被安排到济南消防汽车厂就业。亲属亦受牵连。1980年获平反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并发给生活补助费1000元。至此他说“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晚年先后在石家庄、天津、哈尔滨等地子女家居住，靠子女赡养。为协助编写潍坊二中校志，他不顾年迈，毅然回到故里，为《潍坊二中校志》的上编（文华—广文）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1994年12月14日在家中安静辞世，享年93岁。遵生前遗愿，遗体捐献给哈尔滨医科大学供科学研究。



参见：巴蜀书社《四川基督教》；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潍坊晚报2008年
谭先民：崔德润先生的坎坷人生：本文经崔德润之子崔明时先生审阅修正。